

国际共产史研究

2

人民出版社

2



2 023 0493 3

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二辑 目 录

笔谈：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 如何深入开展共产国际的研究 张中云(1)
谈谈共产国际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宋洪训(9)
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方法的几点启示 刘庸安(16)

- • •
浅析社会党国际的国际政策 张小劲(21)
社会党国际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刘芸影(37)
试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加入共产国际 陈育国(46)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演进的曲折性及其

- 原因 程玉海(67)
论“社会法西斯主义” 孙耀文(80)
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李忠杰(96)
从教条主义危害看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
失误 孙武霞(114)
从“唤起世界革命”到“和平共处”转变的
时间和原因 陈杰军(132)
“季诺维也夫的信”——一个成功的阴谋 陈叔平(144)

人物评传

- 关于斯蒂凡·波尔恩 张奇方(152)

国外书摘

- 民主德国对罗莎·卢森堡著作的出版
和研究 李宗禹(162)

名词和典故

- “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源流考 肖庆平(174)

文献和资料

- 有关“季诺维也夫的信”的几个材料 (183)
所谓“季诺维也夫的信” 谷松译(183)
季诺维也夫对外国报刊代表的谈话 谷松译(185)
英国工党第二十五届年会报告中关于“季诺维也夫
的信”的调查结论 陈叔平译(188)
艾肯·弗格森在英国工党第二十五届年会上就
“季诺维也夫的信”提出的决议案 陈叔平译(189)
英国工党党团在下院提出的有关进一步调查
“季诺维也夫的信”的提案 陈叔平译(190)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 [苏]格·季诺维也夫(191)
董荣卿译
国际与革命 承中译(225)
——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

外论选译

- 一个美国共产党人的自传(摘译) [美]佩吉·丹尼斯(236)
——五十年政治生涯的回顾 劳远回、童一秀译
流放中的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建立 [美]阿奇·格蒂(248)
刘庸安译

《社会主义史》导言 [法]让·饶勒斯(266)
陈祚敏译

工具书介绍

《政治体系和政党世界百科》简介 徐 汝(276)

国外学术会议

马里亚特吉和葛兰西文化政治思想国际

学术讨论会 毛韵泽(278)
第二十二届工人运动史学者国际会议 张中云、朱幸才(283)

简讯 (289)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No. 2

CONTENTS

Forum, Scop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Chang Zhongyun, Song Hongxun, Liu Yong'an

World Policy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A General Analysis Zhang Xiaoj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on Latin America

Liu Yunying

Why Did the German Independent Social-Democratic Party (left) Jo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hen Yuguo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Tactic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Twists and Turns It took and the Causes

Cheng Yuhai

On "Social-Fascism"

Sun Yaowen

Diss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i Zhongjie

Errors in the Guiding Idea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s Manifested in the Harms Caused by Dogmatism

Sun Wuxia

The Change from "Promoting World Revolution" to "Advocating Peaceful Co-existence"

—When Did It Begin and Why? Chen Jiejun

"Zinoviev's Letter"

—A Conspiracy Succeeded Chen Shuping

笔 谈：

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张中云（中央党校国际工运史教研室）

如何深入开展共产国际的研究

共产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当时工人阶级国际组织中有很大影响的组织，在六十多个国家中有七十六个支部，其中十九个同情支部，三百多万共产党员，在四分之一世纪里领导着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还由于它所制定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当代的国际工运和共运，现在执政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和虽未执政、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较大地位的共产党，都曾是共产国际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支部。因此，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一直到今天，它始终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国际问题之一，期间出现过几次研究高潮。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较早、较大的一个支部，我们理应在共产国际的研究中作出贡献。但出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研究开始得既晚，规模又小，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把共产国际列为研究的禁区。所以，与国际相比，我们落后了几十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共产国际的研究也象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一样迅速地开展起来。目

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建立了若干专门研究机构，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并正在开拓具有我国特色的研
究路子。这种状况可以概括地用四句话来表达：“起步晚，形势好，
方法对，有基础。”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定会
有显著成果，缩小与国际的差距。但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我
管见，还需要从方法论方面解决好几个问题。

一是防止受两种僵化思想的影响，而又要善于吸收其中有用的
东西。

共产国际的建立和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
际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有很大不同，这就是以前的这些组织是在
工人运动各派需要加强全面合作，各种不同观点求同存异的基础
上建立的一个协调中心，组织成员之间处于平等协商的地位，而共
产国际是在第二国际中左派与右派、中派在思想和组织彻底决裂
的基础上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指挥中心，受到联共和苏联的强烈影
响。因此，两者相比人们对后者的评价分析和对立更多，其中最大的
是两大派。他们分别出版了许多文献史料和有分量的专著，相当程
度上左右着共产国际的研究气氛和水平。对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地
位和作用的评价，一派是完全肯定，另一派则是完全否定。肯定者
是以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综
观共产国际的全部活动，“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不同时期里，共产国
际的活动曾经有过严重的缺点，有时是犯了宗派性质的错误。但
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不能否定共产国际的伟大历史贡献。”^①否
定者以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脱离共产党关系的一些学
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建立是不必要的、不具备条件的，
是人为的，而建立以后“分裂了”工人运动，成了苏维埃国家“对

① 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

外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的活动充满了“破产和失败”^①。

我们国内学术界原先受到苏联学者的观点的影响，部分也有材料不足和片面的原因，对共产国际基本赞同完全肯定，反对完全否定。但现在经过我们实事求是地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后发现，这两派都有很大的偏颇性，甚至是非常僵化地排斥对方提出的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和见解，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导致了错误的结论，不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推进研究工作。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对这两派不作分析、一概否定。除应摒弃其僵化的研究方式和偏见外，要注意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派为了使自己的论点能站住脚，都发掘和引用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史料作佐证，所以他们许多具体观点和评价的形成能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就为我们进行独立研究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和素材，而且他们的观点和见解能促使我们全面思考问题，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更高的层次上。

二是正确划分共产国际的历史分期，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研究。

要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及其基本经验教训，只是研究其中的局部问题、突出问题并撇开这些问题与共产国际整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历史阶段的联系，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只有对其全部历史作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分阶段的研究才能做到。为此，首先应该把握它的全部活动的历史特点，即活动的历史阶段性。

对共产国际的历史分期，既涉及对它的基本评价，又涉及研究的方法。对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人在论述共产国际整个活动时就是围绕全好或全坏的基调进行，根本看不到共产国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革命高潮阶段和低潮阶段、资本主义经济

^① 参见亚历山大罗夫：《列宁和共产国际》1984年求实出版社版第14页。

危机阶段和繁荣阶段、和平阶段和战争阶段实行过什么不同的政策，有什么得失。

当然，历史分期是史学研究中极为复杂的问题，由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和分期标准不同，会出现极大的差异。从研究共产国际这个特定的对象来说，我以为划分历史阶段至少要考虑两条基本要素：第一条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的重大理论和战略策略方针的制定和确立；第二条各种活动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分期确定以后，就可以把具体活动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进行分析，作出评价，得出较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例如进攻的理论和策略在革命高潮时期是正确的，而在革命低潮时期则是不适用的，仍要加以坚持和推行就是完全错误的。

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共产国际史可划为三个时期七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也可以称作列宁领导的时期，即从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到1922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按照形势的变化和战略策略的变动，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1920年的共产国际一大到二大，是革命形势高涨和实行进攻策略的阶段；1921年—1922年的三大到四大，是革命形势低落和实行退却策略的阶段。这是共产国际活动中最光辉的时期，有缺点和错误，那也瑕不掩瑜。

第二个时期，是从1923年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到1933年底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也可以称作先后由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起主导作用的时期，从这个时期的左倾错误由局部性发展为全局性的过程来看，也可以分作两个阶段：1924年五大到1928年第九次全会，是先后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主持下，左倾错误逐步发展，但正确路线仍占主导地位的阶段；1928年六大到1933年第十三次全会，是在斯大林指导下左倾错误系统化和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第三个时期，是从 1934 年至 1943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就是季米特洛夫领导时期，这个时期围绕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曲折以及功过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4 年至 1939 年苏德条约签订前，是由左倾错误政策到酝酿转变、正式制定、认真贯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和取得明显成就的阶段；1939 年苏德条约签订至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是脱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轨道，服从于苏联对德政策需要的阶段；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至 1943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是重新高举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旗帜，支援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阶段。

三是以几个重要的共产党为典型，分析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以验证共产国际作为指挥中心确定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对各国党的影响。

如果说划分历史分期是对共产国际活动作垂直的系统性研究，那末分析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是横向的分层次研究。前一种是进行宏观性研究，也就是把共产国际的活动与总的时代和形势联系起来，后一种则是进行微观性研究，把共产国际的活动与受其指挥的各国党的活动联系起来。这是全面研究共产国际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共产国际从宏观方面作出的决策，最后要从微观方面落实到每一个国家的党，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也在对各国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目前出版直接和间接研究共产国际的著作很多，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 1919 年至 1982 年已出近三百部，但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作总体性研究的，有关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的著作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应当予以加强。现在限于资料和语种，一时还不可能做到对每一个党的研究，但至少迫切需要首先研究若干个重要的党。它们是：苏联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中

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共产国际的指挥中心实际就是联共的指挥中心，中、后期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基调几乎都是由联共(布)中央定的。

德国共产党在二十年代是共产国际中除联共(布)以外最有影响的大党，列宁一直非常重视德共及其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共产国际最初几年的活动相当多的是围绕德共进行的，德共党内的争论和斗争也都直接联系着共产国际。

意大利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背景和引起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共产国际对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的态度，是共产国际对中派政策的一个缩影，对后来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影响极大。意共在葛兰西领导时期处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既尊重，又不盲从，强调该党在共产国际中应有的独立和自主权利。

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更多地被提上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后来，法共的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政策的产生、执行和曲折，较典型地反映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政策的发展变化。西班牙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西班牙，并力图在西班牙创造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民主专政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

南斯拉夫共产党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党。铁托根据他长期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工作、生活的体会，得出结论：一个党的首脑机关依附于国外的某个中心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当1938年他受命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时，果断地把中央机关迁回国内，独立地探索本国革命的道路，由此同共产国际出现了不平静的关系。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南斯拉夫研究共产国际的活动十分活跃，在国际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是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党，在民

族民主革命中，在对苏联的利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共产国际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思想，一直很注意这两个党的活动，最初几年对印度共产党注意得更多些，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用很多时间来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介入比对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党更多、更深。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大体可以剖析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的得失，并能从这个侧面透视共产国际的整个活动。关于共产国际“两头好，中间差”这个总评价，是从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提出的，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的关系和共产国际的整个活动状况。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党史界较大规模地组织人力投入这个课题的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在一个党同共产国际关系的总体研究上，与国际上的同类研究相比占有领先地位。但是研究还远未穷尽，应该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四是注意研究在共产国际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要领导人的情况。

我们不是英雄造时势论者，但也决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是否正确和在执行中的情况如何，都离不开一些重要领导人的作用。全面研究这些人物的情况，也是全面研究共产国际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他们，我们不仅要研究他们在共产国际说过些什么和做过些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他们的全部活动、理论素养、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历史表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他们活动性质起作用的因素。

例如为什么在处于同样的环境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革命形势都作过过于乐观的估计，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检验，列宁迅速调整自己的看法，改变共产国际的政策；而季诺维也夫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变得越来越左，越来越脱离实际。共产

国际高度集中制的弊端在它建立一开始就存在，但为什么在列宁领导时期，各国党还觉得比较民主，能平等自由地讨论问题，民主和集中得到了适当的处理；而在列宁去世以后季诺维也夫负责全面领导时，高度集中制的弊病日益严重，致使各国党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与共产国际的矛盾日益加深。这不能不考虑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实事求是和民主作风上的差异这样的因素。

列宁去世后，在共产国际中，布哈林在理论方面实际起了第一小提琴手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有许多是出自他。布哈林的左倾错误同他过去的半无政府主义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经历和传统毛病，恐怕是不无关系的。

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在决定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时，常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并且还难于改正，而季米特洛夫相对来说错误比较少些，犯了错误，觉悟和改正也比较快。对于共产国际长期犯的左倾错误，季米特洛夫是所有共产国际领导人中觉察最早，彻底纠正这一错误政策的决心最大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与他长期深入欧洲各地、熟悉实际情况有关。而且季米特洛夫早在1923年就有组织各民主力量同法西斯作斗争的经验，以后又有在莱比锡法庭号召广大群众同希特勒法西斯作斗争并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些是我们研究共产国际在1934—1935年实行政策转变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如果我们在研究共产国际时，不同时研究它的领导人本身的情况，许多问题就难于作出全面的分析。

在共产国际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主席团成员，无疑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其中特别要研究的应是：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托洛茨基、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库西宁、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在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时还要特别研究王明。

以上这些看法未必有道理，仅仅是想在讨论中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宋洪训（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谈谈共产国际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研究在我国被视为禁区，研究人员大都不敢问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像一股沁人的春风吹进了共运史研究领域，共产国际史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出一派清新的景象。当然到目前为止，由于起步较晚，研究的基础总的说来还比较薄弱。西方学者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就对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苏联学术界从六十年代以来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对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并展开激烈的论争。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迥异，国际上对共产国际历史的评价可以说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在共产国际的研究领域中，应当有我们自己的见解，既不能因循以往苏联学术界一唯维护共产国际的观点，也不能步西方学者的后尘，全盘否定共产国际的功绩，因为“一唯维护”和“全盘否定”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应当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面对目前共运史学界掀起的小小的“共产国际热”，谈一谈共产国际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共产国际曾经作为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心，领导了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四十年代初这样一个沧桑变幻的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重视和需要认真研究的。

这里，我想谈几点方法论问题，供研究共产国际史的同行们参考。

一、要历史地看问题，也就是说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列宁反复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就拿共产国际的建立问题来说，西方一些学者通常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是“主观意志的产物”、“即兴之作”。原西班牙共产党人克劳丁在《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中，认为共产国际自始至终充满着危机，共产国际的成立就是“出生证写在死亡证上”，共产国际的解散则是“漫长危机的终曲”^①。一句话，他们认为共产国际本来就不应该成立，成立共产国际是缺乏历史依据和前提的。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呢？我认为不是。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说，历史的经验也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其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活动过程中有许多错误和失策；要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由各国共产党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一个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指导中心，这是不足取的。但是，是不是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共产国际的成立就是历史的误会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这涉及到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当时的实践问题，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世界革命的理论，也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特点、当时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和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环境，等等。

共产国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人运动急剧向左转、第

^① 费·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82年求实出版社版第1卷第1—24页。

二国际破产、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结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从共产国际成立后开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第一国际是在欧洲1848—1849年一系列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但那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唤醒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并在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无产阶级又经历了一个风暴时期，在运动的高潮中诞生了第一国际。高潮的顶峰是巴黎公社，但整个说来，那时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第一国际很快就解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预言，下一个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从巴黎公社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各国无产阶级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联系。第二国际成立后在头二十年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建立了群众性的国际组织和群众性的政党，扶植了社会主义报刊，对工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到二十世纪初，机会主义逐渐占了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纷纷背叛了社会主义，为建立第三国际进行宣传并作了不懈的努力。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都是不成熟的。特别是在左派内部，对于成立第三国际也报以嘲笑和讥讽，响应者寥寥。只有在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欧洲工人运动再次蓬勃高涨起来，建立共产国际的客观条件才渐趋成熟。当时，列宁很明确，要推动世界革命已不能指望第二国际，必须建立第三国际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这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从共产国际成立之后的整个活动来看，共产国际的成立无疑对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利的。共产国际成立后，世界上共产主义的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共产国际通过各种方式，有的是把分散的共产主义派别联合起来，有的是把左派从